

随笔

城市与乡村

许锋

脚下的泥土或我一身的风尘来自何方。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居然为自己来自城市而窃喜,难道城市让我产生的荣耀大过土地肥沃的滋养?我吃的、喝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来自于土地?我为曾有的虚伪而忏悔。我知道,对于目前的很多乡村而言城市是个宠儿。你看,城市有自来水,有高楼,有物业,有天然气,有像模像样的小学、中学、大学,有一辆辆高档的巴士……而乡村,有的土得只剩下渣儿。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座山村干旱无水,水在直线距离为800米的河里。而从山村到河边打水,再从河边背上山村,来回需要4个小时。因为下山、上山的路很陡峭。一个男孩子用背来的水洗脸——方法是把水滴到毛巾上,润湿,用那股湿润劲儿擦脸,再擦手。日日如此。我不知道拉一根直线距离为800米的水管,把水从山下用水泵通过水管打上去需要多少钱,但我知道,这是那个村里农民不敢奢望的梦想。而我在城里,洗热水澡,洗车,洗衣,一次一次,一遍一遍,丝毫体会不到那个男孩子的心情。相比那个男孩子,我们每天都是在对水犯罪。我来自乡村。我热爱乡村。可是,真的生活在那样的乡村里我还会热爱吗?真的让自己每天或几天去背一次水,只能用湿润的毛巾擦脸,因为无水,种不了菜,养不活猪,我还会觉得那是世外桃源吗?一切的美好的感觉,都掺杂着自私的成分。我们在想象城市的美好时仅仅看到的是物质的丰盈。我们在想象村庄的美好时仅仅看到的是风调雨顺之后的年景。当你看到你生活的城市亦有丑陋不堪的一面时;你生活的村庄穷得连水都喝不到时,你所有的想象,都会打折。城市与乡村,或许是我们的头和脚。城市是脸,乡村是脚后跟。脚踩实了,脸才光鲜。但我知道很多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越大的城市里的城里人越瞧不起乡下人。他们倚仗微不足道的优越和支持这些优越的所谓的学历、工作、收入,骨子里对乡下人厌倦。是的,乡下人不是那么文明,他们没有机会见识那么多的文明。不是那么守规矩,他们没有机会见识那么多规矩。乡村没有那么多规矩。城里人若去乡村采风,尿急,在田间地头撒了一泡尿,乡村不会反感,不会对他说什么——若是大家都讲“规矩”,说你这尿污染了环境,破坏了植被,腥臊了原生态的农作物,要你赔礼道歉或跪下磕头,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这片土地上的作物是人家的。城市不是经常这么对待乡下人?不是有城里人让乡下人对她的哈巴狗磕头?有的城里人身体上了楼,思想却还泡在泥沟里。

文明 中原精英



梁邑方足布

(战国)

李文

为市博物馆旧藏,属国家三级文物。币通长4.6厘米,平首,微耸肩,方裆,方足,面背俱有周郭,面有一直纹,上通于首。面文为阳文“梁邑”,在直纹左右,字画纤细,背有一直纹在中,左右各一斜纹,下达于足。为战国魏国铸币。梁邑,地名,亦称大梁,战国魏都,今河南开封市。

我曾以为自己来自城市。或者,我认为来自城市是一件令人非常自豪的事情。记得1987年我到山东济南读书,在全班新生见面会上,我说我来自城市——其实是县城,县城也是城市。而班里很多同学来自农村。区别来自城市或者来自农村的标志是首先你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其次爸爸是工作的还是种地的。那时我爸爸是医院的医生,我妈妈是医院的工人。我们住在县城的楼房里。我一直有意无意地疏远乡村。其实,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农民,我的舅舅们有的不算彻底的农民,却也是“两半户”——舅舅,都没有城市户口,都在城里没有工作,都是农民。我这个城里人就“脆弱”,底子很薄。不用上溯几代我就能从自己身上闻到土腥气。如果亲戚来城里看我,十有八九是带着土腥来的,还有土特产,土豆——我们那儿叫洋芋,以及胡麻油,自榨自榨的胡麻油。他们浑身不像城里人那么光鲜,纤尘不染,皮鞋锃亮,我的亲戚们,很少穿那样的一双皮鞋走路,在乡下,穿着不方便。但他们待我很好,我和他们很有感情。我逐渐明白城市或乡村就是一个符号。我不会再因来自城市或者来自乡村觉得荣耀或者自卑。它们没有什么令我荣耀和自卑的气质或者气场,或者秉性。它们就是一个标签,证明我



荆亚的小院(水粉画) 刘曼文

其实,庙子与老庙仅仅是一岭之隔,庙子在天堂山(又名二郎寨,海拔855米)的东北,地处海拔约110米;老庙在天堂山的西北,地处海拔约400米,只是翻山绕沟地把路给走远了。庙子与老庙都是因庙而得名,庙子的庙叫“神母祠”,敬的是伏羲与女娲的母亲华胥氏,人们都叫她祖母奶奶;老庙的庙叫“玉仙圣母庙”,敬的是西王母玉仙娘娘及麻姑大仙、翠霞大仙等。如此看来庙子的庙是人祖家庙,老庙的庙是人们敬重的神仙庙宇,因此,神母祠应该早于圣母庙。可是,为什么建有神母祠的地方叫庙子?建有圣母庙的地方叫老庙呢?据民间传说,从前,神母祠与圣母庙的所在地都没有名字,因为山里没有识文断字的人,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好。一天,神母祠地方的一个姓张的老头去圣母庙的地方看望一个姓赵的老头,两家是亲戚。中午吃罢饭,张老头要回家,赵老头就叫我送你吧。两人结伴而行,走到天堂山半腰的一个大石庵前,看见石庵下有个个人,他们感到好奇,就想过去看看

究竟。他们来到大石庵下一看,这里石桌石凳俱全,一个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人正在挥笔写字。他们见到了会写字的人,十分敬重,张老头与赵老头同时想到让这个老人给他们所住的地方起个名字。他们把自己想法给白胡子老人一说,白胡子老人欣然应允。在两人各自述说了自己家乡的地方特征后,白胡子老人挥笔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下了“老”、“子”两个字,晾在石桌上。对他们说:“神母祠的拿前边的‘老’字,圣母庙的拿后边的‘子’字。各自回去刻在庙前的石头上,就是你们当地的名字了。”两老头连连点头称是。白胡子老人交代完毕,说声:“走了。”用拐棍在石庵下一捣,捣了个山洞,就钻进去走没影了,惊得两个老头张大嘴巴。他们呆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赶紧扭头一看,石桌上的两张字纸被风吹到了地上,他们都不识字,也分不清那个是前边的那个是后边的了。就一人拿了一张,分手回家了。谁知,他们恐怕错了,到底还是拿错了,圣母庙的老头拿的是“老”字,神母祠的老头拿的是“子”字,回家后分别把字镶嵌在了庙前的大石头上。后来,有识字的人来到这里,问:“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当地人指着庙前石头上的字,说:“你看看,在这儿写着呢。”识字人在圣母庙的地方说这儿是“老庙”,使那里的人大吃一惊;在神母祠的地方说这儿是“子庙”。神母祠地方的人当时就不愿意了,说:“什么子庙?这儿是老祖母奶奶庙!”识字的人立马改口说:“哦,我说反了,这儿是‘庙子’,祖母奶奶送福送子!”这时,双方的人们才知道弄错了。既然是先人把字拿错了,也已经镶嵌在石头上很长时间了,没办法,只好将错就错吧。因此,神母祠的地方叫“庙子”,圣母庙的地方叫“老庙”。庙子这边的人们知道是先人拿错了地名字纸这个故事后,心里很不舒服,叫老庙不叫“老庙”,而给它多加了一个字,改叫“老庙山”了,因为玉仙圣母庙是在半山坡上建造的。后来知道写字起名的老人是太上老君后,人们就把天堂山下的那个洞叫“老君洞”了。

“文学”

王道清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张宁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许燕吉女士的自传,讲述自己80年曲折人生,反映了中国近代一批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命运轨迹,为读者了解20世纪中国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清晰的截面。作者许燕吉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之女。本书分享了自己与父亲许地山相处的点点滴滴,谈及父亲的精神带给自己的影响,她说:“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始终没有失去的,是对人生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坚持,这一辈子,恰如《落花生》一文中所传达的人生理念:不羡慕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不仅是许燕吉女士80年人生自述,也是一部中国20世纪动荡变革的家国史。许燕吉说:“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这是历史的伤口,也正是历史的现实。”

中国道路考

老王

因中国的历史悠久,故道路出现也早,且古代的道路名目繁多。相传,史前因先民作战与生活的需要,黄帝“命竖亥通道路”。“道路”出现了,名称也由此而定。帝尧时,路名“康衢”。西周时,路按等级分别命名:“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眡”走牛车;“径”为仅走马的田间小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力发展交通事业,“秦治驰道”,为中国交通史上空前的大工程。“驰道”又名“真道”,为天子驰车马之道。此外又筑非官道。秦汉以后历朝,路名“驰道”或“驿道”,元称“大道”。清朝“官路”或“大路”。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中国各省普遍修建现代公路,叫作“汽车路”,以后就统一称之为“公路”了。这些公路,大多是土路。新中国成之后,逐渐把土路改造成了洋灰路或柏油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快地发展经济,全国各地改建或新建了许多宽广美丽的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河南省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为全国之冠,为中原崛起,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文史杂谈

古代书籍的厄运(1)

王吴军

在古代,书籍曾经遭遇过令人叹息的厄运,可谓充满坎坷,艰辛无限。先说书籍在秦朝遭遇的厄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郡县制,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这些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当时有一些儒生(也就是读书人),大力主张继续推行殷、周时期的分封制。这些儒生以《诗》、《书》中的文字记载为依据,建议秦始皇废除郡县制,把天下之地分封给皇子和功臣,使其为诸侯,这就是所谓的诸侯制。这其实是一种倒退而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这时,秦朝的丞相李斯批评儒生是在尊古而非今,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于是,秦朝就采取措施,大肆焚书,当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送交政府有关部门“杂烧之”。儒生们若是聚在一起谈《诗》、《书》,就要斩首示众,若是有人敢以古非今,就灭族。而且,有儒生藏书三十日不烧者,就罚他去修筑长城的工地上干四年苦力。秦始皇焚书是古代书籍的第一次悲惨遭遇。秦始皇的大肆焚书,不仅烧毁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而且把自夏至秦两千年的文化、思想的结晶都付之一炬。不过,秦始皇焚烧的书籍只是民间的私人藏书,而秦朝政府的藏书,则是在项羽入关后火烧阿房宫时焚毁的。

连载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世代相传。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宽厚待人

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员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讲:“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习仲勋不仅宽厚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干部。1959年

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干部很紧张。为了保护干部,习仲勋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干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阴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干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勋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干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勋在工作中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支持干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敬仰。习仲勋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1962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

连,他们一同被诬蔑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勋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要保护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炼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他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习仲勋情深义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从不为难别人。有一件事让人非常感动。组织上给他家里派了一位炊事员,后来患上了肺结核病,按规定应该尽快调走。中央保健办的人员找这个人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愿意走,而且当场晕了过去。习仲勋出于同情,不顾把病传染给家人的危险,同意他留下



习仲勋传

来,并帮助他治好了病。习仲勋念旧、念情、念义,从不忘记每一个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和帮过自己的人。有一位战友战争年代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位烈士的遗孤接到家中抚养,供他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他还把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养伤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里住了一位长一段时间。齐心的一位战友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因孤身年迈,也被接到习家给以悉心照顾。与他熟悉的老区劳模、陕西乡党和老家亲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和摆架子。习仲勋还关心和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一有机会他都去看一看。他在广东工作时,许士杰是肇庆地委书记。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得知许士杰因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在齐心的陪同下坚持坐火车从深圳前去广州看望。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